

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二辑

使藏纪程
西藏纪要

拉萨见闻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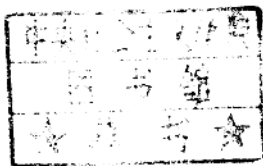
新平知

PDG

西藏社會科學院西藏學漢文文獻編輯室

西藏學漢文文獻叢書第二輯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出版



DR02/2001

責任編輯	主編	顧問
王哲	陳家聰	吳豐培
季垣	拉巴平措	
恒垣		

I 266
99

84514



200409799

使藏纪程
拉萨见闻记
西藏纪要

三种合刊

代
一
0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

前言

《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是西藏社会科学院编印的三种藏学史料丛书之一。原名《西藏研究丛刊》，遵照藏学界朋友的建议，自第二辑起改用今名延续出版。另外两种丛书是《西藏学汉文文献汇刻》和《西藏学汉文文献别辑》。《汇刻》有线装和精装缩印两种版本，《别辑》为线装本。这些书自一九八一年陆续编辑付印，迄今已成书四十多种三百余册。

《文献丛书》第二辑选入史料十六种，已成书的有：《全唐文全唐诗吐蕃史料》、《清政府与喇嘛教》、《清代驻藏大臣传略》、《西康纪事诗本事注》和《西藏春潮》共六种。陆续付印的除《清代藏事奏牍》和《川边历史资料选编》外，还将选入几种民国时期的藏事史料，其中包括朱绣著《西藏六十年大事记》与《西藏纪行》、刘曼卿著《康藏招征》、黄慕松著《使藏纪程》、吴忠信著《西藏纪要》、朱少逸著《拉萨见闻记》、尹昌衡著《西征纪略》、唐柯三著《赴康日记》、李明渠著《筹藏政策》等。

清末和民国期间，由于帝国主义的捣乱破坏，藏地连年多事，分裂和反分裂的斗争空前复杂激烈。其间入藏官员、学者和僧人，为维护领土主权，密切民族关系，据亲身见闻，或据历史文献纷纷著书立说，或向世人介绍藏情，或探讨禦外治边政策，其数不下数百种。《文献丛书》第二辑选入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其他著述，我们将在今后次第择优选入各辑。

编印这部丛书的主要目的，是想为当代学人和民族工作者提供方便，为后世保存文献史料。

藏学汉文文献史料相当丰富，有人估计约千种左右，为数仅次于同类藏文文献。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以往从未经过系统整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和有关部门中，各家收藏有多有少，未听说那一家的收藏是齐全的，使用极为不便。一些前期出版的古籍，大都老化变质，触手纷纷碎落，已不堪用；数以万件计的汉文藏事档案和不少珍贵的稿本，

正在不断散失，急待整理成书。因此，无论从藏学发展和西藏工作的迫切需要考虑，抑或从抢救文化遗产着想，都需要我们自己动手搜集整理。

起初，《丛书》的主要服务对象是西藏的藏学研究者和在藏工作人员，现在它已行销全国，跨出国门，走向世界。这对我们是鼓励，也是鞭策，将督促我们把这件事坚持下去，并做得更好一点，为国内外藏学界多做些服务工作。近年来，海外对西藏的议论颇多，遗憾的是，有不少说法距离西藏的实际甚远，甚至完全颠倒是非。这些人如能摒弃偏见，认真读一点可信的材料，再实地考察一番，就会对西藏的过去和现在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人类总是在不断进步的，如果我们的丛书有助于海外学者和对西藏感兴趣的人了解西藏，有助于国内外学术交流，有助于藏学的发展和西藏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那将是一大幸事。

《丛书》是一部资料书，编纂这类资料丛书，我们主张力求其全，力

求准确，力求有用。只要是较有史料价值的藏学文献，我们都准备编入《丛书》，为国内外读者提供一部史料较为完备的藏学工具性图书。《丛书》拟收录的文献史料约百种左右，要全书成编，还需要做不少事情，也会遇到种种困难，但我们还是想把这件事做完。

在个别藏学家眼里，整理藏学文献是难入藏学研究之流的，这番话已绕耳数年而不去，可见是决心要影响我们的。但离开文献史料，专家又立足于何地？世上人多，各有所好，我们干上这一行，至今不悔，但不悔，而且郑重表示：我们立志为国内外藏学界当资料员，还要力争做一个合格的资料员。

一九八一年十月一日牛力耕于北京

重印《使藏纪程》、《西藏纪要》序

吴丰培

辛亥革命，推翻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举国腾欢，衷心拥护共和，中国振兴有望，企盼民主政权的到来！何意竟被北洋军阀窃夺了胜利果实，互相争夺，兵戎屡见，动荡不安，演成割据局面。北洋政府自顾不暇，政令梗阻，很难过问边远地方事务。西藏地方政府，也如其他地方一样，一度分据藏隅，同中央政府的关系，时近时疏；又因英帝国主义的挑拨唆使，藏军和川军两股地方武装，在康区各地对峙，多年不解，以致音讯阻碍，更形隔膜。

适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与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由于英人挑拨，师弟失和，一九二四年毅然历险东来，奔向内地。当时北京政府极力款待，锡以封号，成立机构，拨给经费，使藏地人民增加了向心力。前曾撰《九世班禅来京前后》一文，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一期。随后，达赖也派要员贡觉仲尼、侍从十人来到北京，其公开职务是雍和宫堪布，实际上是达赖和噶厦的代表，经常与北京政府蒙藏院接洽办事。贡觉仲尼到京后，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递一份报告给蒙藏院，呈报到京日期，并附履历「鉴核备案」。(一)按《理藩部则例》是一部清代管理民族大法，在当

时各民族地区实施，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曾重印发行，仍加沿用，今已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影印出版。）其中对「京城各处职任喇嘛」定额等，均有规定。雍和宫喇嘛虽由达赖派遣，但必需由驻藏大臣呈请理藩部转奏，得旨批准，才能正式就任，故贡觉仲尼仍履行旧章，呈请蒙藏院「鉴核」，足以说明当时西藏派员到京，还是沿用清代规章办事的。

迨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逐渐趋向统一局面。一九二八年贡觉仲尼到南京述职，转达了达赖倾心内向拥护中央的诚意，请求成立西藏驻京办事处，政府拨给经费。经过筹备，于一九三一年正式成立，国民政府照拨经费。从此，传统

隶属关系有所恢复。

事前，政府还多次派员入藏，在一九一九年，当时国务院电甘督张广建，特派专员朱绣、李仲连、红教喇嘛古浪仓等，轻骑简从，由青海赴藏，与达赖喇嘛联络感情。朱绣等一行十二月到达拉萨，住了四个月，一九二〇年四月返回青海。濒行之际，达赖特设筵俎饌，声言：「誓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二）

一九二九年七月，国民政府派遣文官处一藏族女职员刘曼卿，取道西康前往拉萨。刘生于拉萨，求学于内地，热心统一事业，到藏后，住了三个月，达赖两次礼见，态度友好，

曾当面对相告：「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此事详见刘曼卿所著《康藏轶征》。

同时，又派贡觉仲尼回拉萨联系。

一九三〇年，国民政府又派蒙藏委员会专门委员谢国梁、秘书谭云山同去拉萨。国梁在中途病逝，由谭云山带国民政府对解决西藏问题的意见到达拉萨。其中最要二条云：「西藏不得与中国以外之各国发生政治关系，和西藏外交及军政重大事项，应由国民政府负责办理。」

在北京政府时代，先父吴燕绍先生供职蒙藏院宗教科，主管喇嘛事务，凡西藏及各地有职位的喇嘛到京，均有礼节

性的拜访。国民政府成立蒙藏委员会，内设藏事处，处理西藏一切事务，还举办蒙藏学校，培养蒙藏民族人才。又明令宣布：「西藏民族与汉满蒙回各族，同为中华民族，自不应加以歧视，以后对于西藏民族，不得沿用番蛮等称谓，以符中华民族一律平等之旨。」（三）

二十余年中，派遣公务及其他人员，经常不断；通过上述往来和沟通，加之英帝策划夺权阴谋败露，达赖内向之情加深，看到中央渐有统一的局面，故有靠拢的愿望。前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对达赖的回忆有云：「达赖喇嘛……内心则常觉接近祖国以延续其对西藏之封建神权

统治，终较沦入英国外教之殖民统治为得策。加之西藏广大爱国力量对他也不无影响，所以在他一生中不少事实说明，他既不易为亲帝上层分子所左右，亦不会受英帝国主义所銜勒，长期对祖国抱着若即若离的犹豫观望态度。这种态度也与祖国当时反动政府的民族歧视政策和对帝国主义的软弱屈从，认为不足恃等因素，有极密切之关系。」（四）他的评论尚属客观。

在西藏代表贡觉仲尼等所撰《达赖事略》中亦云：「惟时达赖自思，政体既已革新，中枢政治当不似清季摄政王时代之暗昧，虽只致力于藏中政教之治理，实未尝一日忘情于

中央，恒思乘机恢复旧有关系，以符五族共和建国之真谛也。……民国十七年……即遣代表持文入藏慰问，达赖固自喜出望外，私幸宿愿可偿，藏众尤惊喜若狂，故代表在藏倍受隆重待遇，达赖遂亦派遣代表入都，重图团结，虽其间川藏稍生隔阂，说明十三世达赖拥护国民政府，主张恢复中央与西藏旧有的隶属关系。」（五）此项记载，出自西藏代表之手，表达了十三世达赖的真实感情。

三十年代初期，中央同西藏地方的关系颇有冻解冰融之较好形势。故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西藏地方政府依例呈报中央，热振呼图克图摄政也